

生产

第五辑

P R O D U C I N G

德勒兹机器

P R O D U C I N G 5

思想的形象 吉尔·德勒兹

游牧艺术：空间 吉尔·德勒兹

哲学剧场：论德勒兹 米歇尔·福柯

绝对的内在性 吉奥乔·阿甘本

意义与方向感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汪民安
主编



“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
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术馆

德勒兹机器

PRODUCING
生产

第五辑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 第五辑, 德勒兹机器/汪民安主编. 广东美术馆主办.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633-7024-5

I. 生… II. ①汪… ②广…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德勒兹
(1925~1995)—哲学思想—文集 IV. C53 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4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70 千字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专题：德勒兹机器

上篇：德勒兹文选

- 003→思想的形象 吉尔·德勒兹
051→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吉尔·德勒兹
076→什么是生成？ 吉尔·德勒兹
110→资本主义的再现 吉尔·德勒兹 费立克斯·瓜塔里
135→游牧艺术：空间 吉尔·德勒兹

下篇：关于德勒兹的评论

- 183→哲学剧场：论德勒兹 米歇尔·福柯
214→绝对的内在性 吉奥乔·阿甘本
240→《存在的喧嚣》(节选) 阿兰·巴丢
272→哲学见习期 迈克尔·哈特
285→德勒兹的几个主题 康斯坦丁·V. 庞达斯

CONTENTS

评 论

311→论尼采的“永恒轮回” 汪民安

艺 术

355→物质性与空间 尹齐 汪民安

文 献

362→意义与方向感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专 题

德勒兹机器

上篇：德勒兹文选

思想的形象

吉尔·德勒兹

陈永国 译

哲学中的起点始终被正确地看作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起点意味着清除一切预想。然而,虽然我们在科学中面对的是精确的公理可以清除的客观预想,但哲学中的预想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所谓客观的预想,是指一个特定概念所清楚地预先假定的概念。比如,在《第二沉思录》中,笛卡儿不想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因为这样一个定义清楚地预设了理性和动物性的概念:在把“我思”作为定义呈现出来时,他声称避开了所有客观的预想,这些预想阻碍了通过种属和差异运作的那些程序。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并没有避开另一种预想——观点中而非概念中包含的主观的或隐含的预想:假定在抛开概念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懂得自我、思维和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思”的纯粹自我似乎成了一个起点,仅仅因为它用所有的预想回指经验的自我。此外,虽然黑格尔为此批判了笛卡儿,但就他自己而言却没有走相反的路:纯粹的存在者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实际上用所有的预想回指感性的、具体的、经验的存在者。当海德格尔启用对存在的前本体论的理解时,相同的拒绝客观预想的态度出现了,但其条件是假定同样多的客观预想(这也许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相同预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中没有真正的起点,或者说,真正的哲学起点,即差

异，本身已经就是重复了。然而，这个公式，以及把哲学看作一个圆的想法，要有那么多的阐释以至于我们不能太谨慎。如果这是在结尾时再次发现开头的东西的问题，如果这是承认、阐明或从概念上解释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暗示出来的东西，那么，不管这个过程多么复杂，不管这个作者或那个作者的程序之间有多少差异，事实仍然是，所有这些都太简单，这个圆实际上并不怎么圆。圆的形象反而会告诉我们，哲学在真正开始时是无力的，实际上只是真实的重复。

追问什么是主观的或隐含的预想也许更好些：它的形式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在哲学的和前概念的意义上……大家都知道自己思想和存在是什么……结果，当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假定他的那些前提的普遍性——也就是存在和思想是什么——都会得到含蓄的理解，没有人会否认怀疑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存在……**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否认**，是再现的形式和再现者的话语。当哲学把开端放在这种隐含的或主观的预想上时，它可以说声称是清白的，因为它没有保留什么——当然，除了主要的东西——也就是这种话语的形式。然后，它把“白痴”与博学者对立起来，把善意与充溢的理解对立起来，把仅仅富有天赋思想能力的个人与时代的普遍原则使之反常的人对立起来。¹¹哲学家站在白痴的一边，就仿佛白痴没有任何预想一样。实际上，白痴与博学者具有同样多的预想，只不过他用另一种隐含或主观的形式、“私下的”而非“公开的”形式拥有这些预想；是天赋思想的能力使得哲学宣布开始，在没有预想的情况下开始。

但是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孤立的和热情的呼喊。当他们否定“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时，他们怎能不孤立呢？又由于他们否认据说是没有能够否认的东西，那又怎能不热烈呢？这种抗议并不以贵族偏见的形式发生：这不是很少有人思考的东西的问题，也不是懂得思考是什么意思的问题。相反，这是有人——即使是唯一的人——以必要的谦虚不去设法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并谦虚地否认大家都应该认识的东西的问题。这个人既不让别人代表他，也不希望代表任何事物。不是天赋善意和思考能力的个人，而是充满恶意、既不设法思考自然也不设法思考概念的个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没有预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效地开始，有效地重复。对这个个人来说，主观的预想与客观的预想一样都是偏见：白痴和博学者是同一个误导的人物，不应该相信他。非要冒险扮演白痴的话，那就以俄国人的方式，即地下工作者的方式，在对天生的思考能力的主观预想中与在对文化各个时代的客观预想中，都能认出自己，但没有画圆的圆规。这样一个人是没有时间的，既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永恒的。阿·舍斯托夫以他提出的问题，他显示的恶意，他置于思想之中的思考能力的缺乏，他在这些问题中提出的双重维度，都既是最激进的开始，同时又是顽固的重复。

许多人都乐于说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或者说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只要没有那个粗暴的对话者起身回答，说他不希望被这样代理，说他否认并不承认以他名义说话的人，他们就会轻易地取得胜利。）的确，哲学家不从什么利益出发：他所提出的被普遍承认的东西也就是思考、存在和自我所意味的东西——换言之，不是特定的这或那，而是普遍的再现或承认的形式。然而，这个形式是有物质的，而且是纯粹的物质或元素。这个元素只包含这样一个命题：天才天生就有思考真理或临近真理的能力，就思者而言是善意，就思想而言是正直的天性。正是因为大家都天生就思考，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思考是什么意思。因此，最普遍的再现形式见于常见的一个元素中，常常被理解为正直的天性和善意（白痴和正统）。哲学的隐含预想或许见于普遍天赋的我思这个共识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哲学就可以开始了。没有必要复制哲学家的宣言，从“大家都天生就有思考的欲望”到“善意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中分配最公平的东西”，从而证实这样一个预想的存在。它的重要性与其说在它所激发的清晰的宣言中，毋宁说在于

它在恰恰将它隐藏起来的哲学家当中的持存。哲学的假设并不是哲学家要求接受的命题；相反，恰恰是仍然隐含的命题主题，而且是以先在于哲学的方式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哲学思想就把思想的前哲学的自然形象当作它隐含的预想，而那是从纯粹的普通元素那里借来的。根据这个形象，思想与真实具有亲和性；它在形式上拥有真实，在物质上想要真实。正是根据这样一个形象，大家都知道而且被认定都知道思考是什么意思。此后，哲学是否以客体或以主体开始，以存在或以存在者开始，就无关紧要了，只要思想始终服从于这个已经事先判断了事物的形象，这就是存在和存在者以及客体和主体的分配。
我们可以称这个思想形象为教条的、正统的或道德的形象。它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唯理论者”和“经验主义者”不以相同的方式假定它的建构。此外，如我们看到的，哲学家往往三思而后行，他们在接受这个隐含形象之前还要对概念思想进行清楚的反思，从而抽取出更多的特性来，而对概念思想的反思恰好是与这个形象相对立的，倾向于推翻这个形象的。它仍然固守在隐含的领域里，尽管哲学家明确指出真理毕竟不是“容易获得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唾手可得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说思想的这个或那个形象，因为它们随所论哲学的不同而不同，而说普遍的单一形象，它构成了整个哲学的主观预想。尼采对哲学的最普遍前提提出了质疑，他说这本质上都是道德问题，因为只有道德能力让我们相信思想有善的本性，思想者有善的意志，而只有善才是思想与真理之间的所谓亲和性的基础。实际上，除了道德，以及把思想给予真理、把真理给予思想的善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吗？……结果，没有任何预想的一种哲学的条件就更加清晰可见了：非但不受到思想的道德形象的支持，它反倒把对这个形象的根本批判和它所暗含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它不是在与前哲学的形象的协同中，而是与这个形象的激烈斗争中发现其差异和真正的开端，进而

宣布这个形象是**非哲学的**。^[2]结果，它将在一个没有形象的思想中，甚至以最大的破坏和最大的非道德化为代价，并在没有同盟而只有悖论的一种哲学的矜持中，一种将抛弃再现形式和共识因素的哲学中发现真正的重复。仿佛只有在从形象及其假设中解放出来时，思想才开始思考，并不断地开始思考。如果不首先对歪曲思想的形象的那些假设予以判断，重构真理学说的主张就是徒劳的。

思考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善的本性和善的意志，这都不是**事实**。“大家”都熟知的是，人们很少思想，即使思考也是在一种突如其来 的冲击之下，而不是在思想趣味的刺激之下。此外，笛卡儿著名的建议，善意（思考的能力）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中分配最平等的东西，^[3]这个建议无非基于一句老话，因为它等于提醒我们，人时刻都准备着抱怨缺乏记忆、想象力甚或听觉，但他们在智力和思想方面却总是受到最好的服侍。笛卡儿能够利用这句老话把思想的形象当作原则树立起来，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哲学家：善的本性及其与真理的亲和力在原则上属于思想，不管把这个原则付诸事实或在事实背后重新发现这个原则有多么难。于是，天赋的善意或共识被当作了纯思想的决定因素。感觉能够判断自己的普遍性，并在理论上假定自身是普遍的和可交流的。为了施行或重新发现这个原则——换言之，应用具有如此天赋的精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因此，毫无疑问，思考实际上是很难的事，而事实上最难的事在原则上仍然是最简单的。正因如此，从思想的本质的角度来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简单的说法毒害了整个笛卡儿思想），方法本身才被说成是简单的。当哲学的预想存在于所谓原则上的思想形象之中时，我们就不再满足于用相反的事实与之对立了。这番讨论必须在理论自身的层面上进行，这样就能看到这个形象是否没有背叛作为纯思想的思想的本质。正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这个形象预先假定了经验与超验的分配，而必

须加以判断的恰恰是形象中暗含的这种分配或超验模式。

实际上确实有一个模式，即识别的模式。把所有能力和谐地应用于一个假定的相同客体之上：可以看到、触摸、记住、想象或构想同一个客体，这就是对识别的定义……如笛卡儿就一块蜡所发表的议论：“我看到的、触摸的、在想象中图绘的当然是同一块蜡，也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那块蜡。”^[4]毫无疑问，每一种能力——感知、记忆、想象、理解——都有自己特殊的给定因素和风格，即作用于给定因素的独特方式。然而，当一种能力把一个客体与另一个客体的能力相等同时，或者说，当所有的能力一道把它们的给定因素关联起来，并把它们自身与客体中的认同形式关联起来时，客体就被识别出来了。因此，识别取决于各种能力协同合作的一个主观原则，每个人……换言之，都是能力协同构成的一个共识；而同时，对哲学家来说，客体中的同一性形式取决于思维主体的统一，对于这个统一而言，所有其他能力都是形态。这就是我思作为开端的意义；它表达主体内一切能力的统一；它据此表达所有能力与一个反映主观同一性的客观形式相关的可能性；它为一个共识的前提提供哲学概念；成为哲学的恰恰是这个共识。对康德如对笛卡儿一样，恰恰是“我思”中自我的同一性成为所有能力协同的基础，才使它们统一于一个假定的同一客体之上。将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我们从未面对过一个形式的、非具体的、普遍的客体，而只面对过由能力的某一确定属性限定和具体化的这个或那个客体。然而，在此，我们必须提到这两个互补的例子，共识与善意之间的确切差别。从纯粹自我的角度来看，共识同一性的标准，是与纯粹自我相一致的未具体化的客体的形式，而善意则是从经验自我的角度进行分配的标准，被定义为这种或那种物体的客体（所以才被认为是普遍分配的）。善意决定每一种情况下各种能力的提供，而共识则提供同一性的形式。此外，如果未被具体化的客体仅仅由于它以某种特殊方式而有资格存在，那么相反，资格只有在假定了

未被具体化的客体能力发挥作用。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而且完全必要——善意和共识是如何在思想的形象中相互补充的：它们一道构成了信念的两部分。就眼下来说，只看一下这些预设本身的突然制定就足够了：一个天生正直的思想的形象懂得思考是什么意思；纯粹的共识因素“原则上”在这个形象之后出现；而识别的模式——就是识别的形式——则在共识因素之后出现。思想本来就是正直的，因为它不是与其他能力一样的一种能力，而是所有其他能力的统一，这些其他能力仅仅是所设定的主体的模式，主体把它们与识别形式中的同一性等同起来。识别形式必然要包括在思想的形象当中，无论是考虑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笛卡儿的《沉思录》，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个形式都是权威的，都决定着对思考的意义进行哲学分析的取向。
这样一种取向是哲学的障碍。假定的三个层面——本来正直的思想，原则上自然产生的共识和一个超验的识别形式——只能构成一个理想的正统。哲学并没有打破信念的工具。哲学无疑拒绝所有特殊的信念。哲学无疑不提倡特殊的善意或共识。然而，它保留信念的本质方面，即形式，以及识别的本质方面，即模式本身（基于假定普遍的思维主体之中，并作用于未具体化的客体之上的各种能力的和谐共处）。思想的形象只是图像，信念在这个图像中通过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而得以普遍化。然而，只要你只从信念的经验内容里抽取，同时保持与信念一致的各种能力的运作，并隐含地保留内容的本质方面，那你就身陷信念的牢笼。我们完全可以发现一个超时间的形式，甚至可以找到一个亚时间的基本物质，一个地下的或元信念：我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而只是被关在原来的洞穴里或不同时代的思想当中，我们不过是用“发现”来吹捧自己，给这些思想贴上了哲学的标签。识别的形式从来没有认可什么，除了可识别的和被识别的东西。形式也只能引发整合。此外，既然哲学认为共识是其隐含的前提，那么哲学的共识又有什么必

要呢？共识表明它每天——不幸的是——都能自行生产哲学。这里蕴涵着哲学代价昂贵的双重危险。一方面，识别的行为显然存在，并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桌子，那是苹果，这是一根蜡烛，上午好，泰阿泰德。但谁会相信思想的命运就是这些行为所决定的，而当我们识别出来时，我们是在思想呢？与柏格森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区分两种识别——对吃草的牛的识别和对陷入沉思的人的识别。第二个和第一个一样都可以说明思想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上面说过，思想的形象必须基于它所声称的原则来判断，而不是基于经验反对的基础。然而，必须给予这个思想形象的批评恰恰是它把假定的原则基于从某些事实的推理，尤其是像识别个人的日常琐事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实；就好像思想不应该在陌生人或比较折中的冒险中寻求模式一样。就拿康德来说吧，在所有哲学家中，康德发现了奇妙的超验领域。他就像一个探险家——不是去发现另一个世界，而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上端和下端。但他做了什么呢？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他详尽描写了三种综合能力，这是用来衡量各种能力的贡献的，所有能力都在第三种综合能力上达到高潮，这就是识别能力，这是以未具体化的与“我思”相对应的客体为表现形式的，而所有能力又都与“我思”相关。显然，康德就这样从心理意识的经验行为中追溯出了所谓的超验结构：从经验理解中直接引发出超验的综合理解，等等。为了隐藏这个太明显的程序，康德在第二版中删除了这部分。尽管最好将其掩藏起来，但带有心理主义色彩的这种追溯方法还是存留下来了。

其次，识别只有在作为一个思辨模式时才是微不足道的。而一旦它达到了目的，把我们引向了目的地它马上就不是识别了。所识别的东西不仅是客体，而且还有与客体相关的价值（在善意的分配中价值起着关键作用）。仅就识别的实践终点在于“既定价值”这一点而言，那么，在这个模式上，作为天赋我思的思想的整个形象就见证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自满情绪。如尼采所说，真理完全

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存在，不必担心那里会有什么混乱或非凡的东西：一个自满和快活的人要不断保证一切能力是人们一点都不必担心的东西，因为那毕竟是‘纯知识’……”^[5]什么是不伤害任何人的思想，既不伤害思想者也不伤害别人的思想？识别是庆祝盛大婚礼的符号，其中，思想“重新发现”了国家，重新发现了教会，重新发现了所有现行的价值，它们就隐藏在永远幸运的未被具体化的永恒客体的纯形式之中。尼采在新价值的创造与既定价值的识别之间所作的区别不应该从相对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仿佛既定价值在流行的时候就是新的，而新的价值不过需要时间就能成为既定的。事实上，它在形式上和种类上都是有差异的。新的，以其开始和重新开始的能力，永远都是新的，就如同既定的从一开始永远是既定的，即便需要一定的经验时间才能得到承认。由新而变成既定的东西确切说不是新的。因为新的——换句话说就是差异——唤引出思想中的力，而这不是识别的力，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式的力，来自未被识别的和不可识别的识别领域的力。这种新的东西会给思想施加哪些力呢？它是从哪个重要的邪恶本性和邪恶意志中产生的呢？它是从哪个剥夺了思想之“内在性”的无基础的核心产生的，而且每次都把它当作从未存在过的东西，而是被迫在束缚中开始的东西的呢？对比之下，嘲笑何以是为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意志斗争呢？斗争只能以共识和既定价值为基础，为了获得现行价值（荣誉、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意识之间进行的一场奇怪的斗争是为了征得由普遍天赋的我思构成的奖品，纯粹识别和再现的奖品。尼采嘲笑有人把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与此关联起来。他称康德和黑格尔是“哲学的劳工”，因为他们的哲学始终标志着这种抹不掉的识别模式。
然而，康德似乎已经准备好推翻思想的形象了。对于错误的概念，他用幻觉来替代：内在幻觉存在于理性内部，而不是外在错误，外在错误纯粹是身体原因造成的。对于本质的自我，他用一个

由时间线索所深深伤害的自我来替代；而在同一个运动中，上帝和自我都遭遇一种纯理论的死亡。但是，尽管这一切，尽管冒着把三大批判的概念机器加以折中的危险，康德并未想要抛弃隐含的前提。思想必须继续享有一种正直的性质，而哲学不能超过共识或“普通大众理性”——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方向。因此，康德的批判至多从自然法则的角度给予思想以民权：康德的批判使共识增殖，使它们像合理思想的自然兴趣一样多。^[5]一般来说，共识总是意味着各种能力合起来作用于某种同一性或识别模式，这是事实；同样也是事实的是，根据这种情况，许多能力中一个活跃的能力要执行提供那个形式或那个模式的任务，同时从属于它的其他能力也要作出贡献。因此，想象、理性和理解联手创造了知识，构成了一种“逻辑共识”。这里，理解是合法的能力，它为另两个合作的能力提供思辨的模式。对比之下，就识别的实践模式而言，理性是主宰道德共识的合法能力。还有一个涉及正当审美共识的第三个模式，其中的能力是自由的。的确，一般说来，在识别过程中，所有能力都是合作的，但合作的方式却根据所识别的客体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认识客体，道德价值，审美效果……康德绝没有推翻共识的形式，只是繁殖它。（现象学不也是如此吗？难道它没有发现第四个共识吗？这次它基于作为被动综合的感性之上——即便它构成了一个元信念，但仍然是信念的囚徒。^[6]）我们来看看康德的批判最终令人起敬到何种程度：知识、道德、反思和信仰都被认为与理性的自然兴趣相一致，它们本身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在与某一种兴趣的关系上要宣布能力的使用是否是合理的。在全书中，可变的识别模式都以能力之间的协同为好的用法，这是由特定共识之下的一个主导能力所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不合理的使用（幻觉）就只能作下列解释：就自然状态而言，思想把各种兴趣混淆起来，让不同的领域相互渗透。这并不防止思想在基础上拥有合格的自然法则，批判给予这个法则以公民许可；这也不是说领域、兴